

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员)、赵安博(延安日本劳农学校副校长)、黄乃(《解放日报·〈敌情〉》副刊主编)等对日工作者充满波折的生平。井上久士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俘虏政策的确立》(藤原彰、姬田光义编:《日中战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战活动》,青木书店1999年版)一文,阐明了野坂参三到达延安以后俘虏政策的改进。赵新利所撰《日中战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対日プロパガンダ戦術・戦略》(早稻田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从二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共的对日工作。

在国际问题方面,高桥伸夫的《中国革命と国际环境》(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一书认为,毛泽东以理解和利用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独特观点,保持着与共产国际相对独立的考察国际局势演变的思路。抗战末期,为了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并给国民政府施压进而实现联合政府,中共被迫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但内战将至时中共则主动摆脱了这种框架。加藤公一的《中国共产党の対米认识とソ連の対日参战问题》(《历史学研究》第751号,2001年)一文,论述了中共面对抗战末期出现的新局势,如美国登陆中国作战和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主动灵活地应对,尽可能利用苏美力量以建立对己有利的局势。

总之,近些年来日本学界对中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课题研究,作为从宏观角度阐释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政治权力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也向着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深入展开与综合联系上有所突破,开始注重中国革命与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生态间的关系及两者关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研究思路上也与中国同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这是日本学界日益进步的关键所在。可以相信,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完善,并取得更大成就。

收稿日期 2015-03-25

作者丸田孝志,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科学学部教授。

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王爱云

近年来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持续深入,呈现出令人瞩目的鲜明特色。新的研究项目不仅为欧美抗日研究流入新的活力,而且正在改变欧美研究力量分布的格局;欧美主导的国际合作共同研究经久不衰,中国学界正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美在转移研究重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时候,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这一切使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国内学界同人关注。

—

在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中,美国、加拿大向来为执牛耳者,他们设立前沿研究项目,组织国际学术活动,涌现出傅高义、麦金农、卜正民、戴安娜·拉里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知名学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中心,欧洲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迅速崛起,成为国际上不可小觑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力量。

自2007年起,在英国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资助下,牛津大学设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China's War with Japan),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主持,团队成员有赖小刚、海伦·施奈德、聂洪萍、马修·约翰逊、艾伦·威廉·穆尔等近十人。该项目致力于通过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分析战争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影响,促进西方社会对战时、战后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全面客观的了解。

该项目自成立以来非常活跃。首先,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拉纳·米特等研究人员在《近

代中国》《欧洲东亚研究》《近代亚洲研究》《中国历史评论》等杂志发表诸多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如赖小刚的《跃向胜利:山东省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财政力量,1937~1945》(荷兰: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版),拉纳·米特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奋斗》(企鵝出版社2013年版),阿伦·威廉·穆尔的《书写战争:士兵记录下的日本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其次,主办或合办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欧美、中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如2008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的“二战在亚洲和欧洲:战争、记忆与和解”会议,2009年在威尼斯召开的“欧洲、意大利与中日战争”学术会议,2009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如何讲述故事:东亚战时一代及其战后历史记忆”讨论会,2010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中日关系长弧:三个时代中国看与日本战争、合作和冲突”会议和“全球化世界中的跨国历史:过去与现状”会议,20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的“东亚的战争与冲突:关于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新思路”会议和在牛津大学召开的“1937~1949年战时和战后中国的救济与重建”会议、在杭州举办的“蒋介石与二战”会议,2012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研讨会。再次,邀请国际上一些知名专家到牛津大学举办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报告,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例如2008年邀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新动态”的报告,2009年邀请剑桥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专家方德万研讨“二战的结束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邀请华威大学克里斯蒂安·赫斯博士研讨“从殖民港到生产城市:战争、工业化与大连的定位,1937~1955”,2011年邀请莱斯特大学托比·林肯作关于“占领局限的映像:1938~1941年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恢复与重建”的报告,等等。复次,积极参加欧洲及国际间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学术活动,或撰写学术论文,或举行学术讲座。该项目还联合蒋经国基金会、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翰·费尔基金、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近代亚洲研究》编辑部,组织欧洲的抗日战争研究人员撰写了9篇文章,作为“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历、记忆与影响”(China in World War II, 1937~1945: Experience, Memory, and Legacy)专刊发表于《近代亚洲研究》2011年第2期。通过这些活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熟悉中国、客观公正地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学者,成为目前西方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最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

此外,在欧盟研究基金组织——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资助下,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设立了“战争罪行与帝国项目”(War Crimes and Empire),致力于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日本帝国主义的衰落及战后东亚为合法性而奋斗拼搏的历程,探究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自我重新定义并于1945年后走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阴霾。该项目由日本研究专家顾若鹏主持。自2013年至今,该项目组织召开了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分别为“国际战争罪行审判中的台湾战犯”“战后日本的衰落”“媒体对东亚历史形成的影响”,并邀请中国、美国等知名学者开办一系列讲座,同时发表与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顾若鹏的著作《人鬼人:日本的战争罪行与中国的公平正义》(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集中研究战后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司法审判和政策取向,分析最终造就冷战期间东亚现实政治格局的、复杂的中日政治较量,展现出当时形成的冷战因素,有助于了解当下西方史学界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及战争罪行审判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二

欧美学者一贯注重通过国际合作,来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早在2000年,哈佛大学傅高义就联合日本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中国大陆近代史专家杨天石共同发起组织“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A Joint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旨在促进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上的合作。该项目成立后,已经于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2004年在美国夏威夷、2006年在日本箱根、2009年在中国重庆、2013年在中国重庆连续召开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分别为:战时中国地方问题,中日战争军事历史,战时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战时国际关系,二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目前该项目已经从最初包括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加拿大4个国家的学者,扩展到涵盖英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切实成为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的跨国学术平台。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重庆召开,为中国学者参与其中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中国学者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逐步进入西方主流学界。在2009年的会议上,“重庆抗战工程”和“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概念首次推向国际学术论坛,得到积极回应。会议发出了《重庆倡议》,充分肯定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到2012年1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邀请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4位成员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欧美学界主导的另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是201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牵头组织的“重写抗战史,1931~1945”联合研究项目(Revisit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它致力于利用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文献等国民党档案新史料,组织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美国的历史学者共同撰写一部抗日战争史。由于撰写者背景不同、立场各异,尤其是中日学者在七七事变性质、南京大屠杀人数等问题上的争议,该项目存有较多争论,不得不每年在胡佛研究所就争议问题展开讨论,邀请国际上相关专家参与评议。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多名学者作为评议专家出席“重写抗战史”工作坊。例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多次参加“重写抗战史”项目的讨论会议,发表了对抗战历史若干问题的看法。通过参与国际学术合作,我国学者的研究逐渐被西方抗日战争研究学界所重视和接纳。

三

综观近年来欧美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内容,首先其研究重点发生明显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的抗日战争研究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敌后战场而展开,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革命经验和成功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欧美抗日战争研究重点显然转向国民党统治区、正面战场以及沦陷区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生态。关于中共抗战的研究成果,据笔者在Jstor、Proquest这两大学术期刊数据库和Ebrary电子图书数据库所搜索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论文、书评和图书来看,欧美的专门研究很少,代表作主要有赖小刚的专著《跃向胜利:山东省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财政力量,1937~1945》,考察了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山东省的财政收入和供应体系。诸如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改革及其与财政崩溃的关系(如斐利克斯·伯金:“国民党政权的毁灭:1937~1945年财政崩溃中的行政改革”,《近代亚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国民党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动员和重建计划(如罗安国:“建设国家,服务前线:抗战时期中国边境地区的动员和重建”,《近代亚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国统区新生活运动中的战时动员和国家控制(如富得利卡·弗兰提:“战争中的新生活运动:1938~1942年重庆、成都的战时动员和国家控制”,《欧洲东亚研究》第11卷第2期,2012年)、1938年武汉保卫战等国民党正面战场(如史蒂芬·R·麦金农:《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加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问题,都是欧美学者关注的内容。他们还从不同视角对伪满洲国、汪精卫政权等统治下沦陷区的政治、社会状况等进行研究。例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著的《合作:战时中国的日本代理与地方精英》(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分析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上海等地沦陷区的复杂性。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历史系诺曼·史密斯的《反抗的“满洲国”:中国女性作家与日本的占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西方第一本关于伪满洲国妇女史专著,它以日本殖民统治前后伪满洲国女作家的活动和作品为中心,呈现伪满洲国殖民文学作品的特色,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

其次,欧美研究抗日战争的视角发生重要变化。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东西方冷战等因素,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美众多二战史的书写中,只见太平洋战争和欧洲战场、原子弹和苏联出兵,鲜有关注中国的八年抗战。近年来,欧美学界认识到以往对中国战场的忽视和遗忘,从而将中国抗日战争纳入整个二战视野,展现了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中国人民的战时苦难生活,由此阐述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例如前述拉纳·米特的著作《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奋斗》,采用中国视角,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整个战场,包括陪都重庆、沦陷的上海、被屠杀的南京、红色延安的艰难历程给予了全景式叙述,并

分析了这场战争对于二战的贡献和战争创伤对中国战后发展的影响。该书认为,战争一结束,中国在二战中的伟大贡献就被西方忽视和遗忘了。为了进一步阐述其观点,2013年10月18日,拉纳·米特在《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又发表了《世界欠中国战争债》(The World's Wartime Debt to China)一文,指出:“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战胜日本所做的贡献,从未获得过充分肯定,并且现在也尚未转化成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

在中国视角下,战时难民是欧美学者着墨浓描的对象。例如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历史系教授萧邦齐的著作《痛苦之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研究了浙江省数以百万计中国难民恶劣的生存状况。战争带来极大灾难,但也促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迁徙、大交流。因此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麦金农在《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不仅将难民视为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逃亡者,还把她们作为东南地区先进文化的载体与传播者,认为东南地区难民大量涌入西部大后方,对当地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牛津大学穆盛博则从抗战时期华北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了难民与环境变化的互动关系。他的代表作《1938~1950年华北的战争生态:河南省黄河流域》(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937~1945年战时中国的难民、土地开垦与军事化地貌:陕西黄龙山》(《亚洲研究》第69卷第2期,2010年5月),研究了1938年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对豫东地区的影响,尤其是造成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安置河南难民,动员他们在陕西省黄龙山开垦土地,导致了森林砍伐和加速了水土流失。

再次,从长时段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欧美学者对战争记忆尤其是中日两国如何记述和看待抗日战争有浓厚兴趣。2006年,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吉田敬的著作《日本、中国、美国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形成》(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跟踪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美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认识变化,揭示国内外社会、政治环境对这些认识变化的影响。总体来看,欧美学者既关注日本教科书中弱化对中国等亚太国家进行殖民主义侵略历史、不愿教育青少年正确对待过去历史进行反思的状况(参见彼得·卡夫:《日本教科书中的日本殖民主义和亚太战争:表述的变化及其原因》,《近代亚洲研究》第47卷第2期,2013年3月),又研究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记忆及其变化。例如,有人分四个阶段考察了1949~2010年中国官方历史话语中对于抗战集体记忆的变迁(参见詹姆斯·赖利:《记住历史,而不是仇恨:中国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近代亚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还有人研究中国战时、战后关于抗日战争记忆由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到强调日军暴行下中国受害的主题变化(参见柯博文:《书写暴行:战时记述及其当代应用》,《近代亚洲研究》第45卷第2期,2011年3月)。

欧美学者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视野也在扩展。除了对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等日军暴行进行专门研究外(如若林正主编:《南京暴行,1937~1938:复杂化的画面》,博格翰图书2007年版;丘培培等:《中国“慰安妇”:日本帝国主义性奴隶的证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不少学者在东京审判的研究中记述日军的侵华暴行,将二者结合起来,展示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例如夏威夷大学户谷由麻的《东京战犯审判:二战后对正义的追求》(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日本学者田中利幸、澳大利亚学者蒂姆·麦科马克、英国学者格里·辛普森共同主编的《超越胜利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荷兰尼伊霍夫出版社2010年版),都从历史学的角度充分证实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细菌战、性奴役等罪行。

收稿日期 2015-03-25

作者王爱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9。